

【乡村社会发展】

# 乡村韧性：一个新的学术议题的理论审思

刘 轩 刘祖云 杜焱强

(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南京 210095)

**摘 要:**乡村韧性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议题。本文基于背景、结构与策略的认知理路,从环境、系统、行动三个维度出发,构建“环境风险-系统资源-主体行动”的分析框架,深入阐释乡村韧性的核心要义和演化逻辑,力图揭示乡村韧性在复杂环境中生成发展的本质规律。从环境维度看,乡村韧性在环境风险作为触发条件的动态进程中被建构起来,契合了乡村应对环境风险的历史、理论与现实三重逻辑;从系统维度看,乡村韧性生成于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乡村,由环境、经济和社会三类系统资源构成,并在“涟漪效应”和“锁定效应”的互动过程中,影响自身的生成与演化;从行动维度看,乡村韧性需依托“党-社-农”三角互嵌结构,在多主体的统合互动中,通过适应、恢复、协调和变革四类行动,维持乡村系统的平衡与稳定。乡村韧性作为风险社会中应对不确定性的核心能力,唯有深刻把握环境、系统与行动之间的理论张力,才能充分释放乡村发展潜力,进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关键词:**乡村韧性;理论审思;三维框架;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25)02-0039-13

当前全球社会正深陷日益复杂的风险旋涡,不仅面临自然风险与技术风险的双重挑战,还因认知模糊、信任危机与治理失灵表现出高度不可预测性,“一个以风险为核心特征的新型社会形态正在到来”<sup>[1]</sup>。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乡村正在经历人口、经济、社会 and 气候等多方面的变革,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例如,人口和精英群体流失导致乡村应对风险能力逐渐减弱;洪涝、干旱和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设施破坏和农业生产受阻,尤其是粮食安全面临巨大考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等社会性危机,引发农业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加深了农民生计的脆弱性。因此,如何增强乡村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全面深入理解乡村韧性的本质特征和内在逻辑,已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议题。

增强乡村韧性已成为当前农业农村领域的热点话题,催生出乡村适应力、乡村韧性治理、气候韧性农业、农业产业韧性等一系列相关概念<sup>[2]</sup>。它们从不同视角切入,活跃于学术研究、政策制定和新闻媒体等话语体系之中。它们既可以是理论概念,用以理解乡村在不确定环境中的适应机制,也可作为政策概念,为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具体方略,还可以是工程技术概念,用于实践中指导乡村建设。每个概念都有其关注焦点、核心问题和叙事架构,虽各有侧重,但其核心要义与内在逻辑常常交织重叠。这种“概念丛林”现象模糊了对“乡村韧性”本质的认识,形成了一幅看似丰富却略显凌乱的概念图景。因此,如何从理论上廓清乡

收稿日期:2024-07-1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协同增效机理及调控路径研究”(42371305)

作者简介:刘轩,男,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刘祖云,男,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杜焱强(通信作者),男,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村韧性的概念命题,揭示其本质特征与内在逻辑,已成为亟待深入探讨的课题。本文旨在对乡村韧性进行系统分析,以期构建一个逻辑清晰的综合性理论分析框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启发与决策参考。

## 一、“乡村韧性”缘何提出?

尽管国内学者关于乡村韧性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17年才进入快速成长期,但“乡村韧性”并非一个新生词。英文“Resilience”发端于拉丁语词根“Resilire/Resilio”,语义为“Bounce”(弹跳),培根可能是最早使用Resilience的学者<sup>[3]</sup>。沿着“工程—生态—演进”的逻辑理路,韧性的理论内涵历经两次范式转换,已从最初的“复原理念”发展为涵盖适应、转型、创新等元素的复合型理论,成为分析复杂系统动态演化机制的重要工具。西方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将韧性理论从硬科学延展到软科学,掀起一股韧性研究的学术热潮,这为乡村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理论视角,成为分析乡村问题的热门方向。

乡村韧性因其跨学科特征呈现多样化视角,同时也存在许多观点分歧。总体来看,西方研究具有显著的社会文化倾向和自由主义色彩,倾向从微观视角关注地方主体对风险的认识和应对策略,主张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增强乡村韧性,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与之相比,国内学者倾向从政府干预、城乡结构、集中式科层和国家—社会理论等宏观层面展开讨论,更注重探讨如何通过政策工具、制度设计和基层治理等手段建设乡村韧性。综合而言,学界关于乡村韧性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其一,风险科学中的乡村韧性。此类研究多从风险评估出发,关注乡村在面临自然灾害、极端气候和突发公共事件等非常态化情境时的风险响应能力<sup>[4]</sup>,或是主张加强监测系统、基础设施等工程建设<sup>[5]</sup>,或是通过构建基层网络、优化应急体系来强化对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sup>[6]</sup>,具备明显的“遇灾/冲击—减灾/响应”的研究特征。其二,治理视域下的乡村韧性。作为一种理论模式,韧性同更广泛的乡村治理议题紧密相关。近年来,乡村韧性治理已超越狭义的风险治理范畴,涵盖乡村体制机制、贫困问题和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陈桂生等基于社会系统理论,探讨数字乡村的韧性治理策略,以提升复杂环境下的治理效能<sup>[7]</sup>;姜国俊等提出将政党力量融入乡村治理,持续增强治理的韧性与有效性<sup>[8]</sup>。其三,发展导向下的乡村韧性。韧性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范畴和原则,许多研究关注如何通过多元经济、党建引领和治理变革等路径提升乡村抗风险能力,以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资明贵等从构建乡村韧性指标体系入手,量化不同乡村发展能力差异,并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sup>[9]</sup>。

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乡村韧性的理论与实践诉求,并具有一定启发意义。然而,现有研究的分析视角相对零散,缺乏一条贯穿始终的分析逻辑与理论脉络。同时,学者似乎陷入了对乡村韧性诠释的重复,其理论构建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充分揭示其本质内涵与动态演化机制。一方面,风险科学中的乡村韧性大多遵循“恢复原常态”的硬学科思维,虽然操作性、可观测性较强,却忽略了乡村社会的主观能动性,使研究结论缺少清晰且适切的行动指引。另一方面,无论是“治理视域”下的乡村韧性还是“发展导向”下的乡村韧性,局限都在于宏大的理论设想难以落地,在理论建构中容易陷入同义反复,未能形成系统化的分析框架。基于此,本文围绕“乡村韧性”提出三个核心问题:第一,我们如何科学审视乡村韧性?或者说,能否建构一种区别既有研究的新视角?第二,如何对乡村韧性进行理论解读,以揭示其演化逻辑与生成机制?第三,乡村韧性最终应导向何种结果?回答这些问题便构成了本文的叙述

逻辑。

## 二、乡村韧性的分析框架:环境、系统和行动

### (一) 研究乡村韧性的既有理论框架

从既有文献来看,学界关于“乡村韧性”的讨论主要有三种理论框架:其一,压力—状态—响应理论(PSR)。作为风险学科中常用的理论模型,它遵循系统在环境风险中的“压力感知—状态调节—响应行动”的逻辑链条,将韧性视为系统应对环境扰动的调节能力,旨在揭示“系统与环境的互动耦合关系,并刻画两者之间的因果循环机制”<sup>[10]</sup>,适用于分析乡村如何应对自然灾害、极端气候和突发公共事件等具体情境。其二,复合生态系统(Complex Ecosystem)模型。该模型以生态系统科学为基础,关注乡村空间中生态、经济、社会等子系统的耦合关系,主张“多维系统通过资源、能量和信息的流动协同,实现整体功能的动态平衡”<sup>[11]</sup>,模型认为乡村韧性不仅取决于子系统的适应能力,更依赖子系统的交互作用,特别是在要素分配、资源整合和功能协同等方面的互动效应。其三,适应性循环(Adaptive Cycle Theory)。该理论着眼于系统的时间演化与动态循环,将韧性视为在“增长—保守—释放—重组”四个非线性阶段中实现能量转换、结构调整与功能再生的能力,强调“系统在经历环境扰动时,能主动释放旧有资源,重新配置结构要素以适应环境变化,从而保持整体功能的连续与可持续”<sup>[12]</sup>。除上述三种框架外,乡村韧性研究还包含其他多样化的理论视角(表 1),它们共同构建起乡村韧性研究的丰富图景,也为韧性规划与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操作工具。

表 1  乡村韧性研究的主要理论框架信息表

理论框架	核心内涵	适用情境/场景	理论贡献与局限性
压力—状态—响应	“压力—状态—响应”链条解析系统对环境风险的响应与调节能力	自然灾害、极端气候、突发性公共危机	结构化逻辑清晰,但强调线性因果链条,忽视长期动态与多主体互动
复合生态系统模型	各子系统通过耦合协同实现动态平衡与整体优化	生态治理与修复、城乡规划、可持续发展	关注多系统协同,综合性强,但忽视系统内行为主体的反馈机制
适应性循环模型	系统在“增长—保守—释放—重组”循环中调整与再生的能力	环境变化与转型、灾后恢复、区域发展	关注系统纵向演化机制,但忽视情境异质性与多要素交互作用
社会—生态系统	整合社会与生态系统,研究符合系统多要素的耦合关系及其适应性	社会—生态危机、综合风险分析、系统治理	突出了生态与社会交互,但对动态调整及反馈机制的操作化分析不足
系统资本模型	将韧性视为多种资本(人力、经济、自然、社会、制度)的综合表现,关注资本互动机制与协同效应	社区发展、风险治理(如经济危机与自然灾害)	突出了资本之间的协同作用,但对资本动态变化和跨领域作用的深入分析较少
结构要素模型	以韧性结构要素(如适应性、灵活性、变革性等)为维度,操作化测量灾害前、中、后的韧性表现	自然灾害、极端气候、灾害管理、韧性评估	提供具体化、可操作的分析工具,但忽视不同情境下要素之间的动态关联性
敏感指数模型	基于核心变量与基准,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和计算敏感指数量化系统韧性	发展经济学、政策评估、资源配置优化	提供定量分析工具,但指标选择与权重分配存在主观性,且对复杂社会系统解释力有限

上述框架为乡村韧性提供了多元、广阔的分析理路,并且都具有各自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但是,相关学术讨论仍有进一步展开的空间。首先,压力—状态—响应理论更关注外部环境与内部系统的关系,其线性逻辑忽视了环境与系统在长时段内的交互效应,限制了该理论对乡村系统动态适应和调整能力的揭示。其次,复合生态系统理论虽然关注多维系统的耦合协同,并展示韧性生成的动态复杂性,但存在明显的“结构二重性”特征,倾向于以结构—功能为分析核心,对多元主体的能动性、与反馈机制考虑不足,难以完整呈现乡村韧性的动态生成过程。再次,适应性循环理论从时间视角切入,通过四阶段模型解析乡村韧性的演化机制,突出系统重组与转型潜力,但其分析更多聚焦于系统本身,未能充分兼顾环境风险、组成要素与行为主体间的复杂交互,而忽略不同情境中的异质性特征。最后,尽管其他分析框架为乡村韧性提供了多样化的理论工具,但它们或在动态调整能力的操作化分析上有所欠缺,或对多情境下的要素异质性和系统性考量不足,或因过度依赖指标选择与权重设定,影响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都应基于乡村韧性概念本身,构建逻辑严密且契合中国发展情境的理论框架,并将其构成要素以更系统的方式呈现出来。

## (二) 乡村韧性的分析需要关注的维度

乡村韧性主流框架尽管分析侧重各异,但体现以下共同属性和基本原则:第一,它们均致力于揭示韧性在应对复杂环境中的生成逻辑,这一特征指向乡村韧性的“环境属性”,即环境风险作为韧性触发条件的动态作用;第二,它们均强调系统要素间的耦合作用,这一原则指向乡村韧性的“系统属性”,即多维系统资源在交互过程中建构起抗风险能力;第三,它们一致承认多主体适应性行为的重要性,这一特性指向乡村韧性的“行动属性”,即行为主体不仅在系统内部实现要素整合,还能反作用于外部环境,调整风险挑战的影响路径及其效应。

作为一种理论探索,本文基于大量文献资料以及相关分析框架,遵循“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的思维逻辑,围绕“乡村韧性何以产生—乡村韧性何以定位—乡村韧性何以可能”的叙述脉络,试图深入解析环境、系统和行动三大核心维度,并通过系统呈现乡村韧性在生成背景、本质结构和实践策略的内在逻辑与演进关系,力求揭示复杂环境中乡村韧性生成与演化的内在机理。

### 1. 环境维度:乡村韧性何以产生

外部环境的冲击是乡村韧性产生的基础触发条件。从词源学角度看,韧性概念本质上指向系统对环境的响应能力,也就是说,没有环境风险就没有乡村韧性,对环境风险的有效应对是乡村韧性生成的逻辑前提。因此,深入分析环境维度不仅是理解乡村韧性的起点,更是揭示其生成与演化机制的重要基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乡村发展受到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等多重张力影响,这些变化引发的环境风险,不仅体现在重大危机对乡村造成的急性、直观的结构破坏,还体现在由全球化、工业化等社会力量引发的慢性、隐性功能性消解,使得乡村发展呈现衰弱、转型与重塑并存的复杂态势。然而,这种复杂的环境风险也孕育着乡村韧性的生成潜力,作为一种“倒逼机制”,它也给乡村发展带来了改革转型的契机。因此,对环境维度的分析不仅要关注其中的风险挑战,还应关注环境内蕴的“机会窗口”,把握环境的压力转化与反馈机制,理解其如何成为乡村韧性生成与演化的驱动因素。理解环境维度的双向作用机制,是全面揭示乡村韧性生成逻辑的关键所在。

### 2. 系统维度:乡村韧性何以定位

“乡村韧性”自诞生以来,始终具有系统导向特征。因为环境风险是系统性的,风险影响也是系统性的,这意味着适应环境风险的乡村韧性也应该是以系统为导向的。这种“系统属性”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一,乡村韧性生成于乡村系统,其本质是系统中各种资源的存量和阈

值,它们对乡村韧性的生成具有关键性的内部支撑作用。其二,这些资源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并在功能和作用上呈现显著差异,它们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并在多样化的交互过程转化成乡村韧性。其三,理解系统资源的动态协同机制是全面认识乡村韧性的关键。这种协同机制不仅增强了系统应对环境扰动的能力,还能推动系统优化,使乡村在复杂环境中实现持续发展。可以说,乡村韧性的系统维度不仅指向韧性生成的客观空间,涵盖资源的静态存量及其分类,还涉及这些资源在动态环境中的交互过程,进而解释乡村韧性的生成场域、静态结构及其动态演化问题。理解系统维度,不仅是回答“乡村韧性是什么”的关键基础,更是解锁其生成机制的重要路径。

### 3. 行动维度：乡村韧性何以可能

在如何塑造乡村韧性的问题上,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产生了不同的理论观点,但其核心共识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单独处理乡村面临的环境风险,唯有多方主体的协同行动,才能维持系统与环境的动态平衡。因为,无论是作为触发因素的“环境”,还是作为内在结构的“系统”,都需要通过行动主体的能动性反馈,才能转化为实际的韧性表现。换句话说,乡村韧性不仅是一套回应环境风险的系统资源,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行动过程,行动主体的嵌入与效能发挥,使得韧性从结构化的系统属性转化为复合型的行动过程。一方面,主体不仅是环境风险的承受者,也能够通过行动调节和管理环境。另一方面,只有通过不同主体的行动,才能在原本静态、分散的系统资源之间建立有效连接,激活潜在资源、激发内生动力,最终汇聚成推动乡村韧性生成与演化的强大合力。因此,行动维度不仅回答了“乡村韧性何以可能”的问题,更揭示了乡村韧性生成的社会逻辑,只有通过多元主体的协同努力,乡村系统才能构建起抵御环境风险的持久韧性。

### (三) 理解乡村韧性的“三角模型”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乡村韧性是乡村应对环境风险的综合能力,这种综合能力使乡村社会能精准快速地组织资源并展开行动,以最大化减少损失,并在遭受冲击后,能迅速恢复系统的安全稳定与功能运转。其中,环境风险的触发、系统资源的配置以及主体行动的响应,共同构成了乡村韧性的理论要素,其互动关系也成为理解乡村韧性生成与演化的关键切口。

#### 1. 环境风险是乡村韧性的研究起点

“韧性思维的核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观点,即事物皆在变化。忽视或抵触这一变化,我们就更容易受到伤害,也等于我们放弃了机会。”<sup>[13]10</sup>关于环境与人类的互动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中,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人通过物质生产实践彰显并确证本质力量,“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sup>[14]</sup>。也就是说,乡村环境作为一种基础性结构,不仅是考察乡村系统和行动者的外在尺度,更体现了一种“建构性力量”,参与乡村韧性的生成与再生产,从而解答了“乡村韧性如何产生”的问题,并揭示乡村在不利条件下所展现的生存、演化与发展的韧性能力。因此,考察环境风险对理解乡村韧性具有重要意义。

#### 2. 乡村韧性建立在强大的系统资源之上

所谓系统资源,即指乡村系统中各种物质(土地、资源、空间等)与非物质(文化、价值、关系等)要素的集合,“这些要素各自独立又相互作用,使得系统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能够同化一切环境变化”<sup>[13]30-31</sup>。系统资源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对乡村韧性的支撑作用,因为“充足的系统资源能够增加乡村韧性、降低脆弱性,反之,则会降低乡村韧性、增加脆弱性。同时,由于乡村系统之间相互关联,一种资源的变化可以直接影响另一种资源”<sup>[15]</sup>。也就是说,系统

资源不仅是乡村韧性的基础,也是乡村在动态环境中实现自我调节与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所探讨的“乡村韧性”实际上就是将“抽象的韧性”在乡村系统资源的结构尺度上具象化,借助生态、经济和社会三维资源的概念化模型,回答“乡村韧性何以定位”的问题。

3.行动主体承载乡村韧性的实现机制

“我们所处的世界,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呈现动态变化,管理系统提高它们的韧性至少与管理特殊产品的准备一样重要;韧性思维得以完善并在实践中获得成功,需要人们与其所在的系统通力合作”<sup>[13]xi,145</sup>。也就是说,虽然可以通过环境风险和系统资源的互动关系理解乡村韧性,但是只有在乡村行动者将这些关系内化,并围绕着这种内化的交互过程加以建构时,乡村韧性才得以生成并增长。换言之,不同乡村主体的“行动”承载着乡村韧性的实现机制,它主导着行动者如何同环境风险及乡村系统展开联系,并决定乡村韧性能否生成及其发展方向,这回答了“乡村韧性何以可能”的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构建出一个理论分析的三角模型(图1),形成用以理解“乡村韧性”的整体性框架。其中,环境风险、系统资源和主体行动形成了一个互动互构的三角形,共同影响着乡村韧性的产生与发展。

首先,无论是系统资源的运行,还是主体行动的产生,二者实质上都是对环境风险的客观反映。每个乡村系统及其行动者都是在环境扰动的影响下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并反映出与之对应的价值和特征。在与环境持续互动的过程中,环境风险既是一种“消极的力量”不断造成局部性损失或结构性破坏,又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提供改变现状的动力。其次,系统资源和主体行动之间也存在着双向互动机制。一方面,系统资源赋能主体行动,为其提供必要的要素支持。因为资源的丰富性和可获取性直接影响主体行动的效果,是其得以展开的物质基础和现实场域,强大的系统资源不仅能为主体行动提供支持,还能显著增强乡村系统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主体行动激活系统资源,通过实践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没有有效的主体行动,系统资源即使丰富,也可能无法得到充分利用。反之,即使在最为贫瘠的乡村,强有力的主体行动也会使乡村韧性生成与增长成为可能。最后,无论是系统资源,还是主体行动,都有其反馈属性,因为环境风险对乡村系统和主体行动的影响并不是单向度的。其中,系统资源对环境风险的抵御能力体现了乡村韧性的被动反馈机制。资源的存量、类型和阈值将直接影响乡村抗风险能力,当资源匮乏时,系统将难以有效承载外部冲击,其脆弱性随之加剧。与此不同,主体行动则具备更为主动的调节作用,能够通过多种策略调节环境风险带来的影响,甚至将之转化为发展机遇。这种双向反馈机制揭示了环境风险、系统资源与主体行动的复杂相互作用,对理解乡村韧性的成因和演化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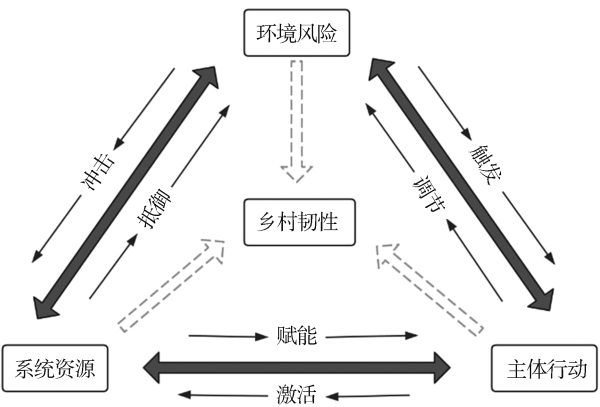


图 1 基于“环境-系统-行动”的乡村韧性理论框架

三、环境风险:乡村韧性的生成背景

解读环境风险是理解乡村韧性生成背景及其演化逻辑的起点,关键在于考察乡村应对风险扰动的策略选择与核心机制,这是由历史、理论和现实三种视角决定的。



第一,从我国乡村环境演变及其响应模式的历史进程看,可分为农业社会的刚性防御、工业社会的弹性控制以及后工业社会的韧性响应三种模式。它们体现出不同时期对环境风险的认识与应对策略的选择,为理解“乡村韧性为何发生”提供了历史的视角。

在农业社会,乡村空间尺度较小,人口与资源流动缓慢,同外部环境的互动极为有限,主要受到自然灾害、冲突战争等外部风险源的威胁。此时,乡村主要依赖“时空隔离”的应灾逻辑,聚焦于生存和安全,通过防御、隔离等“刚性防御”的承灾策略,确保乡村远离外部危险,或在遭受重创后恢复原状。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传统“田园牧歌式”乡村被解构,其内在要素与空间结构愈发复杂多样。英国学者奥克夫在《揭开自然灾害的“自然”面纱》中指出:“人类社会自身的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加剧了社会脆弱性……灾害不仅是‘自然’产物,更是人类社会制度中的脆弱环节所致。”<sup>[16]</sup>环境风险生成逻辑的变化要求超越“刚性防御”策略,采用更为灵活的“弹性控制”手段来增强乡村的应灾能力并减少其脆弱性,进而降低环境风险的负面影响。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推动着乡村进入“后工业时代”,使其面临更加复杂且跨时空的风险挑战,建设“更有韧性的乡村”成为国际乡村发展的重要战略<sup>[17]</sup>。正如乡村韧性概念的提出者 Adger 所言:“乡村韧性是社区保持社会结构、抵御外部风险的关键能力……以发展地方应对变革的行动,实现与不确定性的共存。”<sup>[18]</sup>作为一种新的风险应对策略,“韧性响应”主张拥抱不确定性,关注动态适应能力,推动从“原/新常态”到“无常态”的响应逻辑转变,同时强调在韧性建设中遵循“人”的逻辑,充分发挥地方性力量的作用与价值。总的来说,“韧性响应”在反思传统模式的基础上,在更高层次上回到了“环境风险”本身。它不仅吸纳了刚性防御和弹性控制的特点,还进一步地把握了后工业社会中乡村面临风险挑战及其新特征,以实现“从风险中来,到风险中去”。

第二,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现已成为透视社会现象较为完整且富有解释力的范式<sup>[19]</sup>,这就为理解乡村韧性的“环境风险”维度提供了恰当的理论视角。

无论是哪种视角下的风险理论,其核心都在于阐述“(低)脆弱-(高)韧性”这一学术概念的逻辑关系。在理论家眼中,风险的本质是脆弱性和韧性互动过程中的某种表征,而当脆弱性超越韧性占据主导地位,环境风险就显现出来了。于是,倘若乡村系统被推上“(即将爆发的)文明的火山”的同时,环境风险的治理模式却并未及时变革,仍旧遵循着传统“冲击—响应”的治理路径,便无法在复杂的风险挑战中独善其身,也就难以维持系统的有机运转。乡村韧性的内在逻辑与风险社会及其治理模式高度契合,尤其是在面对不确定性环境时,乡村需要在自我修复与动态适应中追求发展。因为“风险以否定的方式揭示存在之意义……这既可能导向人的自我实现,也可能否定这种自我实现”<sup>[20]</sup>,所以从风险社会的逻辑来看,发展的关键变成了“在否定中肯定地保持自身”。也就是说,乡村发展不仅要求更高的指标性结果,还需避免发展过程中断与破坏,而后者以“韧性的发展”逻辑关注风险中“肯定的可能性”,使风险不再仅是危险,而是内化为不确定性环境中乡村发展的机遇与动力。

第三,当下中国乡村发展面临的多维、复杂的环境风险与挑战,既是阻滞乡村发展的现实原因,又是乡村韧性的驱动力量,这构成了理解环境风险的现实的视角。

一方面,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乡村同外部环境深度交织,导致了日益复杂的风险面向。乡村不仅面临气候变化引发的频繁的自然灾害,还遭遇产业变革带来的复合型发展压力。在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情境中,乡村同时受到急性的结构性破坏与慢性的功能性消解两种风险挑战。此外,这些风险又在不同区域呈现差异化影响,强势地区的负面效应被“压缩”,而在弱势地区被“放大”,使得乡村发展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环境风险引发的乡村衰落,催生出中国式“乡村韧性”的理论命题。随着社会发展阶段向

后工业社会转型,乡村衰落是一个难以避免的过程。因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乡村必然会置身于全球风险体系中,其生产要素、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将面临持续冲击,若无法有效应对全球环境风险及其引发的社会转型,乡村便将持续衰退乃至彻底消失。正因如此,亟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韧性”:首先,需要准确把握中国乡村韧性的生成环境。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乡村环境具有更高的异质性,其强大的社会资本、复杂的人际网络以及丰富的地方记忆,为乡村韧性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其次,我国独特的土地制度和城乡结构,使乡村成为环境风险的“蓄水池”。只要农民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就能在农业生产和外出务工中自由选择,从而极大增强农户韧性。最后,必须警惕西方出现的“韧性陷阱”。乡村韧性若无差别地抵御所有环境风险,而不加以辨别其是否为“有益”风险,容易导致系统的僵化,抑制创新。同时,西方发展经验表明,空洞的“乡村韧性”口号容易引发“福柯式陷阱”,使得环境风险的政治属性被淡化,成为上级推卸政治责任的借口,将应对风险挑战的压力转嫁到地方。

#### 四、系统资源:乡村韧性的本质结构

乡村韧性作为应对环境风险的关键能力,其本质结构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到乡村场域,探讨哪些要素支撑着乡村韧性,并分析其类型及效用。更重要的是,这些要素是否相互交织、协同运作?如果是,那么这种机制是如何展开的?接下来,我们将从三个方面逐步揭示乡村韧性的本质结构及其生成机制。

第一,韧性生成于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乡村场域,因此必须先探讨乡村系统的场域特征,才能回答乡村韧性是什么、如何生成以及怎样发挥作用的问题。

作为第三代系统理论,霍兰(Holland)于1994年提出的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 CAS)理论为理解乡村韧性的系统维度提供了新的视角。该理论认为,系统是在适应性主体的非线性作用中生成和演化的,其核心思想是“适应性造就复杂性”<sup>[21]</sup>。作为典型的复杂适应系统,乡村同样具备复杂性和适应性两大特征,其交互作用便构成了乡村韧性生成的空间逻辑。一方面,复杂性为乡村韧性的生成提供了可能性。霍兰在《复杂性》中明确指出:“突现行为是称系统为‘复杂’的基本要求……复杂系统是生成的,而非构成的。”<sup>[22]</sup><sup>4</sup>他进一步指出:“只有通过构成系统的基本单元之间的非加和性作用才能获得对突现现象的一般理解。”<sup>[22]</sup><sup>32</sup>也就是说,乡村系统中多层次要素的非线性关联,构成了系统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为韧性生成创造了可能性空间,使得高度适应的突变行为能够被选中,从而推动系统的持续演化与发展。例如,农民为应对市场波动自发组织合作社可视为突现行为,它能够集中资源、共同生产销售以实现规模效应。与此同时,合作社反过来改变了乡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网络,这就有可能重新定义乡村关系格局,于是,乡村韧性及其生成系统又在“动态中复杂化了”。另一方面,适应性为乡村韧性的生成提供了关键动力,这体现在系统的开放性、多样性以及自适应反应中。第一,开放性使乡村系统能从外部获取“能量”来维持生存,乡村之所以能适应环境风险,是因为从环境中获取的能量超过了系统内部的能量耗散。第二,必要变异度定律指出“能量耗散”依赖于系统内部多样性,即系统资源要素的类型越多,越能增加适应环境的可能性<sup>[23]</sup>。第三,霍兰在《隐秩序》中提出,复杂适应系统能对外界干扰作出自适应反应,以实现对外部环境的主动认知,并产生与之相应的集体适应行为<sup>[21]</sup>。

第二,既然乡村韧性依赖于系统资源的支撑作用,那么如何在现实乡村中观察与认知乡村韧性这个抽象概念?

一般来说,每个乡村系统都既包含土地、空间等物质要素,也包含文化、关系等非物质要



素,它们涵盖了生态、经济和社会三种类型。这些资源要素共同支撑起乡村系统的稳定性与适应能力,也成为认知乡村韧性客观表现及其结构的静态模型。首先,生态资源是乡村韧性的物质基础,它不仅提供了乡村社会正常运行所必要的生产资源和空间,也涉及人与生态的互动关系。生态资源提供物质性能量,这是乡村得以生存的基础。正如埃德加·莫兰所言:“一切系统都必然扎根于自然界……且必定会在能量上付出代价”<sup>[24]136</sup>,乡村通过与生态系统的物质性交换才能维持正常运行。人与生态的互动同样是生态资源的组成部分,它构成了“生命与社会再生产的重要向度”<sup>[24]209</sup>,并直接影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再生产能力。其次,经济资源是乡村韧性的核心驱动力,在内部(如生产、收入)和外部(如市场、投资)经济要素的互动中,对乡村系统产生复杂影响。正如贝克所言:“财富在上层聚集,风险在下层聚集。”<sup>[25]</sup>经济资源越强,越能化解环境风险,而人们往往容易忽视经济增长的隐形代价。例如,当商业资本获利远超农户收入时,容易引发收入不平等、地方资本流失、本地企业萎缩等问题,破坏乡村原有的社会关系、治理体系和文化资源,形成“道德破产”的逐利空间,消弱乡村韧性。最后,社会资源是乡村韧性的“润滑剂”和“加速器”,涵盖社会网络、权力组织、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等非经济属性,具体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微观层面的结构性力量,如人际关系、风俗习惯和文化价值观,它们作为社会活动的产物,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二是中观层面的制度性力量,例如组织制度、权力体系、管理机制等,它们能有效规避现代风险中由社会制度缺陷引发的问题;三是宏观发展背景和社会结构,包括城乡关系、国家政策和阶层等,它们决定了乡村资源的数量、质量和可得性。

第三,当环境、经济和社会资源水平较高且协调一致时,三者交会处可以找到最强的乡村韧性。那么,这三类资源是如何实现交汇的?它们又通过何种机制在交互过程中影响乡村韧性的生成?

一方面,乡村系统作为一个动态开放的整体,不同资源要素之间高度关联,任何局部变化都会引起整体调整,形成由局部向全局扩散的“涟漪效应”。这种效应复杂多变,导向的结果也不尽相同。例如,较强的社会资本能团结行为主体、强化社会凝聚力,不仅有助于发展经济,还能保护生态环境,然而它也可能诱发“保守主义”,阻碍乡村改革与创新,削弱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sup>[26]</sup>。也就是说,资源互动引发的“涟漪效应”,其结果并非简单的“非正即负”,而是动态和不稳定的,随时可能朝不同方向转变。另一方面,系统理论认为,系统存在自我僵化的倾向,其资源具有“锁定效应”。任何系统生成后,都会经历较长的稳定守恒期,在此期间,随着资源要素被锁定、固化,系统将失去改革的机会,除非被“锁定”的资源能被重新释放,才可能实现系统的解构与重组,从而迈向更高级的发展阶段<sup>[13]75-76</sup>。总而言之,正是由于存在“涟漪效应”与“锁定效应”两种互动机制,三种资源重叠区域内的最强“乡村韧性”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难以在现实中找到具体样本。而即使在最脆弱的乡村地区,也存在产生和增长乡村韧性的潜力与可能。

## 五、主体行动:乡村韧性的实践策略

既然乡村韧性源自不断变化的环境风险与承载风险的系统资源,并且系统与环境间的动态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乡村多元主体的行动实践塑造,那么,这就引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谁是中国式乡村韧性的行动主体,他们的作用与效能是什么?这些主体通过哪些行动来维持系统平衡?这些行动为何发生,其背后的差异化逻辑是什么?

第一,乡村韧性是否需要“主观行动”的嵌入,如果需要,那么在中国乡村治理情境中,这

些行动主体及其各自效能又是什么?

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为乡村韧性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视角,他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指出,行动系统是行动者与环境持续互动的结构体系,行动者依据动机适应情境变化,并在稳定的相互期待中依托系统结构展开行动,以满足系统的功能需求<sup>[27]</sup>。换句话说,只有通过实际行动,系统中的潜在资源才能被激活,乡村韧性才能发挥作用与效能。在乡村韧性行动主体的定位问题上,学界普遍认为,单一主体难以应对乡村面临的复杂风险,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在中国乡村治理情境中,党政干部、社会组织和农户家庭共同构成了乡村韧性的“行动三角”,他们分别担任韧性实践中的主导者、协调者与响应者。首先,党政干部是乡村韧性的“元行动者”,这是由我国乡村治理的多层面向决定的。在价值层面,党政干部作为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核心主体,引领乡村韧性建设,体现了其法理责任与利益诉求的双重价值。在制度层面,党政干部不仅能通过纵向科层的“强制性协调”提高资源利用率,还能依托“核心化的党委”与“行政化的居委”协同机制,确保国家意志在地方的渗透与执行<sup>[28]</sup>。在效能层面,党政干部与高层政治的紧密互嵌,使其能有效下沉资源,营造乡村韧性的物质环境。此外,党政干部还能完善沟通与协调机制,引导村民行为,提升社会力量的参与效能。其次,催生“集体行动”的社会组织。面对村民多元需求与利益冲突,由于科层体制的对话模式在现实中往往会面临“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社会组织的作用显得尤为关键。受地方感和共同体意识影响,村民通常会自发形成地方性组织,它们能有效降低韧性建设中的交易成本。同时,在地方性组织的推动下,工商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外部力量也能更有效地使资源集聚下沉。因此,在乡村韧性建设中,应积极动员各类社会组织,凝聚全社会的积极要素,形成一股强大的“集体力量”。最后,遵循“人的逻辑”的农户家庭。农户家庭是乡村的灵魂,也是乡村韧性的核心参与者和影响对象,激发其内生动力是提升乡村韧性的关键保障。作为环境风险的直接承受者,农户需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激发自身及其家庭的潜在资源与动力,尽可能地减轻环境风险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农户还应积极参与志愿队伍,增强乡村应对风险的力量,通过互助、关怀等自组织行动,以“反哺”的形式增进乡村利益和集体福祉。

第二,乡村韧性建设离不开行动主体的具体实践活动。那么,这些主体究竟采取了哪些行动?这些行动又是如何在乡村韧性的演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

行动系统至少需要满足适应、维持或潜伏、整合、目标达成四种功能,才能维持自身的运转与平衡<sup>[29]</sup>。首先,“适应性行动”是乡村韧性生成的前提。直观而言,乡村韧性的首要目标是承受风险冲击并避免系统解体。因此,韧性规划不仅需要加强硬件设施建设,提高乡村风险防范的“硬实力”,还需注重“软实力”提升,建立高效的应急联动机制与风险响应体系,以提升乡村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水平。其次,“恢复行动”是达成乡村韧性的基础。一方面,物质资源是乡村恢复的基础,需要建立多方主体的资源整合和共享机制,为乡村韧性持续注入“物质的力量”。另一方面,还需充分动员社会参与,激发同理心和地方认同等“人的力量”,加速乡村空间生产、经济活动和社会文化的恢复重建。再次,“协调行动”是乡村韧性得以稳定和增长的关键。这就要求将不同利益诉求的主体有机联结,综合各方优势,形成“1+1>2”的效应。为此,可以通过推进信息公开共享、落实“一盘棋”等策略,为“协调行动”提供制度保障。只有当乡村系统兼具静态架构的共通性和动态运作的协调性时,乡村韧性才能在复杂的行动网络中生成、增长,从而形成维护安全与促进发展的强大合力。最后,具备增长潜能的“变革行动”是乡村韧性得以持续发展的核心。尽管环境风险会带来损失,但也为重新规划乡村系统打开了“机会窗口”,为提高系统的开放性和发展潜力提供可能。行为主体可以通过学习与反思,从环境风险中吸取经验、总结规律,以不断完善系统结构,为应对未来挑

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第三,在环境与系统的互动过程中,哪些关键内容的缺失引发了主体行动的必要性?上述不同类型的适应性行为何以产生,它们的嵌入又如何推动乡村韧性的演化与发展?

一方面,“人与环境的互动和对资源系统的管理是韧性概念的核心。以韧性为导向的规划应该清晰认识到这些作用,并将‘以人为本’置于工作中心……公民还需认识到,实现韧性可能需要所有家庭和社区成员的参与”<sup>[30]</sup>。也就是说,虽然系统资源为乡村韧性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其不平衡分布往往难以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风险,这就需要行动者通过协调、整合和优化资源来弥补系统的客观不足。另一方面,“弹性实践要求能将系统视为一个整体,并从不同层面理解系统的不同状态……看清系统会在何种尺度上运行,以选择不同的手段去适时地调整系统”<sup>[13]117-119</sup>。换言之,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与系统运行的多层次性决定了需要在不同尺度上采取不同类型的行动,这是实现乡村韧性的关键路径。例如,适应行动通常在突发风险发生时迅速启动,表现为快速反应和精准救援;恢复行动主要发生在灾后恢复阶段,通过资源整合与集体行动恢复系统秩序;协调行动贯穿风险响应的全生命周期,通过多主体的协同与资源互补,确保满足各方利益需求;变革性行动是在长期风险积累和结构性问题的背景下,通过全方位改革推动乡村系统的重构转型。总的来说,不同行动的嵌入是乡村系统响应环境风险、实现动态适应的必然路径,通过“韧性的思维”使乡村从被动承受者转变为主动适应者,从而为可持续发展创造可能。

## 六、结语

受全球人口增长、城市化、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影响,当前全球乡村面临更加严重且复杂的复合风险,变得愈加脆弱,风险分配的层级扩散和城乡差异使得乡村成为承受风险冲击的前沿阵地。为此,本文将“韧性”概念引入乡村治理领域,尝试构建“环境风险-系统资源-主体行动”的分析框架,深入阐释乡村韧性的本质特征与内在逻辑。乡村韧性的核心在于激发乡村系统的内在活力与适应性,以增强其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恢复能力。首先,环境风险是乡村韧性研究的起点,无论是系统资源的运转,还是主体行动的产生,都是对环境风险的适应性反应。任何资源要素和主体行为,都是在乡村环境的影响下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并反映出与之对应的价值和特征。其次,系统资源和主体行动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主体行动能够推动系统资源的运行,并产生“1+1>2”的效果;同样的,主体行动又需要嵌入乡村系统,并围绕着资源的生产、优化来展开,以实现乡村系统的价值与功能。最后,无论是系统资源,还是主体行动,都有其反馈属性,因为环境风险对两者的影响并非单向度,对于这种反馈、调节机制的考察是必要的。

作为研究复杂系统应对环境风险与社会变迁的主流范式,“韧性理论”自提出以来,以其广泛的跨学科影响力迅速成为各行各业关注的焦点,“塑造韧性”已形成全球范围内的浩大声势,支撑起近三十年西方世界“韧性研究”的迅猛发展。然而,韧性概念的深入诠释与理论转化仍是一个亟待探索的学术课题。当前,中国乡村发展进入了“元素混杂”的新时期,现代化、城镇化与工业化深刻转型,为乡村发展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它们能够激发内在动力,推动结构调整与模式创新。在这一过程中,原本受制的潜能得以释放,包括思想观念的解放、生态环境的修复以及社会资本的重建。通过成功的韧性转型,乡村不仅能够有效应对当前的挑战,更能在未来发展中占据主动,以获得更全面的发展福祉,确保乡村不仅能够生存,更能在变革中实现繁荣。



受限于韧性研究的西方化背景以及多学科交叉的特性,本文对乡村韧性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例如,如何系统整合不同学科对韧性的理解,进而更加全面客观地构建分析框架;当乡村韧性理论应用于不同类型乡村面临的多样化风险挑战时,现有的分析框架是否具备足够的灵活性。又比如,本文侧重于对乡村韧性的理论阐释,缺乏对成功与失败经验的系统梳理,这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进一步补充。此外,乡村韧性建设过程中还涉及多元主体的复杂互动,如何在实践中有效协调这些主体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权力分配、资源管理和文化传承等方面的挑战与问题,仍需在未来的研究与实践中继续探索。

## 参考文献:

- [1] 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约斯特·房·龙.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M].赵延东,马缨,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1.
- [2] 郭晓鸣,吕卓凡,周小娟.整体性治理与乡村韧性发展:一个“四维”理论分析框架[J].社会科学研究,2024(4):13-22.
- [3] Bacon F. New Atlantis and Selections from the Sylva Sylvarum[M]. London: Watkins Media & Repeater Books (Publishers), 2020: 140.
- [4] 买欣,陶伟,刘望保.国内外乡村韧性研究进展评述[J].人文地理,2023(2):28-34.
- [5] 杨新军,石育中,王子侨.道路建设对秦岭山区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一个社区恢复力的视角[J].地理学报,2015(8):1313-1326.
- [6] 张震,唐文浩.韧性治理共同体:面向突发公共风险的乡村治理逻辑[J].南京社会科学,2022(10):54-62.
- [7] 陈桂生,彭俊杰.基于社会系统论的数字乡村韧性治理[J].理论探索,2024(2):64-70.
- [8] 美国俊,袁赞.找回群众与双向赋能: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有效的韧性机制——基于C村美丽屋场建设的个案考察[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118-131.
- [9] 资明贵,周怡,罗静,等.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韧性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大别山区罗田县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22(10):1819-1832.
- [10] Cutter S L, Barnes L, Berry M, et al. A Place Based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Community Resilience to Natural Disasters[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8(4):598-606.
- [11] 马世俊,王如松.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J].生态学报,1984(1):1-9.
- [12] Gunderson L H. Adaptive Dancing: Interactions between Social Resilience and Ecological Crises[M]// Navigating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3-52.
- [13] Walker B H, Salt D. Resilience Thinking Sustaining Ecosystems and People in a Changing World[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6.
-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5.
- [15] Kelly C, Ferrara A, Wilson G A, et al. Community Resilience and Land Degradation in Forest and Shrubland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Evidence from Gorgoglione, Basilicata, Italy[J]. Land Use Policy, 2015, 46: 11-20.
- [16] O'Keefe P, Westgate K, Wisner B. Taking the Naturalness out of Natural Disasters[J]. Nature, 1976, 260: 566-567.
- [17] 刘轩,刘祖云,杜焱强.从发现到超越:西方乡村发展思想的理论脉络与研究展望[J].地理研究,2024(11):2989-3006.
- [18] Adger W N, Hughes T P, Folke C, et al. Social-ecological Resilience to Coastal Disasters[J]. Science, 2005(5737):1036-1039.
- [19] 郑红娥,武晋,李小云.风险社会背景下农村突发性事件的风险叙事:暗喻、隐患与应对——以禽流感事件为例[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9-21.
- [20] 郭洪水,朱葆伟.风险的哲学存在论分析——兼论当代风险社会的生成逻辑[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3(3): 99-103.

[21] 约翰·霍兰. 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M]. 周晓牧, 韩晖, 译.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0: 154-157.

[22] Holland J H. Complex Systems [M]//Complexit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3] 范冬萍, 黄键. 当代系统观念与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发展[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1(11): 9-14.

[24] 埃德加·莫兰. 方法: 天然之天性[M]. 吴泓缈, 冯学俊,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136, 209.

[25]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M]. 何博闻,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36.

[26] Castro-arce K, Vancley F. Transformative Social Innovation for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Assist Community-based Initiativ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0, 74: 45-54.

[27] 塔尔科特·帕森斯. 社会行动的结构[M]. 张明德, 夏翼南, 彭刚,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48-56.

[28] 刘祖云, 李焯. 元治理视角下“过渡型社区”治理的结构与策略[J]. 社会科学, 2017(1): 11-20.

[29] 贝尔特, 席尔瓦. 二十世纪以来的社会理论[M]. 瞿铁鹏,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85-86.

[30] 山形与志树, 谢里菲. 韧性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M]. 曹琦, 师满江,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0: 6-7.

(责任编辑: 宋雪飞)

Rural Resilience: A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a New Academic Issue

LIU Xuan LIU Zuyun DU Yanqiang

**Abstract:** Rural resilience is a pivotal strategy in the global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and the advance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well as a critical factor in propelling China’s rural modernization and nurturing high-quality rural development. Drawing upon the cognitive framework of background, structure, and strateg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Environmental Risk-System Capital-Subject Action” across the environmental, systemic, and behavioral dimensions, offering a profound explanation of the core principles and evolutionary logic underpinning rural resilience. The objective is to uncover the intrinsic patterns of rural resilience in its emergence and progression within complex environmental contexts. From the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 rural resilience is constructed through a dynamic process spurred by environmental risks, aligning with the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ponses of rural areas to such risks. In the systemic dimension, rural resilience emerges within rural systems as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comprising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social resources that interact through “ripple effects” and “lock-in effects,” influencing their own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From the action dimension, rural resilience relies on the “Party-Society-Farmer” embedded structure, where the interactions of multiple actors through adaptation, recovery, coord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ctions sustain the equilibrium and stability of rural systems. As the core capacity to navigate uncertainty in risk societies, rural resilience can only fully tap into the developmental potential of rural areas by deeply comprehending the theoretical interplay between environment, system, and action, thereby achieving prosperity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Keywords:** Rural Resilience; Theoretical Reflection; Three-dimensional Framework; Climate Chang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